

# 永明诗僧康宝月及其诗歌考论

包得义

**摘要:** 诗僧康宝月,知名于萧齐永明年间,颇得当时帝王、名臣之赏识;其通解音律,擅长作诗,梁钟嵘《诗品》中称其诗“有清句”。文章探讨了康宝月的生平及其在永明年间的行事,分析了其传世诗歌具有的模仿乐府旧题、表现艳情内容的两大特色,认为其诗风格清新流畅,与文人同类诗作相比也不遑多让。最后论述了其诗歌余韵波及后世,影响颇深。

**关键词:** 诗僧康宝月;中国俗文化;中国古代诗歌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3)1-130-04

**作者:**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暨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5

通晓文艺,善于诗作之僧,称为诗僧。据日本现代学者市原亨吉《中唐初期江左的诗僧》一文的研究,“诗僧”这一名词最早见于中唐释皎然《酬别襄阳诗僧少微》(《昼上人集》卷四)这一诗题中,然而诗僧的产生事实上肇源于六朝时期,唐人即持有这种观念。释皎然《答权从事德舆书》中盛称释灵澈“具文章,挺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未见其偶”<sup>①</sup>,以南朝齐、梁诗僧来衬托灵澈杰出的文学才能;又如唐释神清《北山录》卷九中说“宋慧琳、慧休之流也,二子皆江表诗僧”<sup>②</sup>,又以宋释慧休、慧琳为江表诗僧——这都表明了唐人认为至少从南朝刘、宋时起就已经有诗僧这一特殊的文学创作主体的存在。今据文献考察,晋代支遁、慧远等名僧都创作了不少诗歌,故而僧人创作诗歌的事实至迟在东晋就已出现。今可知东晋南北朝时期创作诗歌的僧侣有40多人,其中知名者如晋之康僧渊、支遁、慧远、帛道猷、竺僧度、竺道宝、竺法崇等;宋之汤惠休;齐之释宝月;梁之释宝志、智藏、慧令、法云等;北周之释亡名、尚法师等;陈之释惠标、洪偃、昙瑗、智恺等,他们创作的诗歌现存近100首,所以有学者言“自东晋至南北朝这一时期虽说还没有‘诗僧’之名,但已有了诗僧之实”<sup>③</sup>,诚哉斯言。他们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多样。虽然整体上良莠不齐,瑕瑜互见,但也存有不少佳作。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偏安建康,交替兴废,时间总计不过一百七十年。其中萧齐一朝国祚仅有24年,是南朝四代中最短命的朝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方面,除了谢朓山水诗创作,沈约、王融等人的“声律论”倡导、“永明体”实践等外,文人文学的成就也乏善可陈。而此时有文名的诗僧更是罕见,据现存资料,齐代诗僧知名者只有康宝月一人而已。惜以往的文学研究者对南朝诗僧这一群体关注度较少,对萧齐硕果仅存的康宝月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就释

宝月及其诗歌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 一 康宝月之生平

梁代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著作,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与刘勰《文心雕龙》堪称南北朝时期文论双璧,前后辉映。《诗品》以上、中、下三品来评论历代诗人诗作,其下品中“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条是目前可知最早评论诗僧创作的文学理论资料,其中评价释宝月的诗歌“庾、帛二胡,亦有清句。”<sup>④</sup>帛指晋释帛道猷,其事迹见《高僧传》卷五;庾则指释宝月,《高僧传》无载。虽然《诗品》中将道猷、宝月连带评论,只有一句,极其简短,但却是最早涉及释宝月诗歌之文,意义非同一般。

传世《诗品》各抄本、刻本称宝月姓“庾”,且为胡人,然僧传、史传中皆无明文记载其姓氏以及国别。然我们翻检唐宋时期的文献,却发现三处“康宝月”的记载。

唐人权德舆《送清洙上人谒陆员外》(《权文公集》卷五)诗有“暂辞老去随缘,候晓轻装寄客船。佳句已齐康宝月,清谈远指谢临川。”<sup>⑤</sup>谢临川者,即谢灵运也。谢灵运在刘宋时曾任临川内史,故有此称。此处权德舆将康宝月与谢灵运对举。

权德舆另有一首诗也提及康宝月,其《与沈十九拾遗同游栖霞寺上方于亮上人院会宿二首》(《权文公集》卷七)其二亦云“名僧康宝月,上客沈休文。共宿东林夜,清猿彻曙闻。”<sup>⑥</sup>沈休文者,即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沈约(441-513年),其为喜好佛教之文士,跟多位名僧大德有交往。此处权德舆又将沈休文与康宝月对举。在这两首诗歌中,权德舆先后用康宝月来比拟清洙上人、亮上人。在权德舆笔下两次出现康宝月,这绝非偶然或者笔误。且权德舆用来和康宝月对举的沈休文、谢灵川俱是南朝时期著名的文坛领袖和崇佛人士,所以康宝月自然也当为生活于南朝时期的知名诗僧。查萧齐时期知名诗僧只有释宝月一人,所以权德舆诗歌中提及之“康宝月”即是《诗品》中所言“齐释宝月”。虽然权德舆是唐代人,其诗歌晚出,但还是很有说服力。因此可以说,权德舆诗歌是宝月俗姓康之明证。

权德舆之后,宋释赞宁于端拱元年(989)书成奏上《宋高僧传》一书,其书卷二九《唐京兆欢喜传附无侧传》载:

有会稽云门寺释无侧者,外国人,未知葱岭南北生也。若胡若梵,乌可分诸。……相传则是康宝月道人后身也,必尝以事征验而知。<sup>⑦</sup>

按,传说唐代会稽云门寺有释无侧,西域人,但是作传者赞宁不知道其具体国籍。然而赞宁在传文中记载了一个有意思的传说,即唐宋之际相传释无侧是僧人康宝月的转世,也用事情得到验证。这又是宝月俗姓康之一证。

由以上三例看来,宝月俗姓康为唐宋之人所熟知,当无疑问。因此,我们赞同前辈学认为《诗品》中宝月姓“庾”乃“康”之误字的推测,古直先生曾分析说:

叔德與《送清上人谒陆员外诗》云:“佳句已齐康宝月”,则宝月非姓庾也。考汉沙门有康巨、康孟祥;曹魏沙门有康僧铠;吴沙门有康僧会;晋沙门有康法畅、康法邃、康僧渊。《高僧传》云:“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云云,疑宝月即僧会、僧渊之族也。康、庾形近易误,故康法畅《世说新语》亦误为庾法畅,赖《高僧传》可证也。<sup>⑧</sup>

而古直所谓“康法畅《世说新语》亦误为庾法畅”者,见《世说新语·言语篇》“庾法畅造庾太尉”条,余嘉锡先生有精妙笺疏:“考晋代沙门,无以庾为姓者。康为西域胡姓,然晋人出家,亦从师为姓,故孝标以为疑。后《文学篇注》于康僧渊亦云‘氏族未详出处’。足证二人皆姓康矣。”<sup>⑨</sup>余嘉锡亦认为《世说新语》中“庾法畅”当为“康法畅”。古、余二先生的推理极为有理。无独有偶,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三〇载张君祖《答庾僧渊》之诗,逯钦立先生考定当为《答康僧渊》。由此三例可知,由于康、庾字形相近,古籍在传抄过程中经常发生误写。晋代康法畅、康僧渊、齐代康宝月等僧人都曾受到此种“伤害”。

我们可以发现,《高僧传》里那些康姓僧人的先祖大都是康居人,后移居中国,比如“释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东吴”、“释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业”、“时又有沙门宝意……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未乱移止吴兴。”可见晋宋时期康居国僧人来中土者,皆冠以康字。犹如天竺国来者,多冠以竺字,如竺佛调、竺法兰、竺佛朔;月支国来者,多冠以支字,如支谦、支昙龛、支昙迁、支婁迦讖等。康宝月的家世也因当作如此理解。简言之,康宝月先祖为西域康居人,后移居中国,而释宝月出生、成长在中华,“盖为西胡族类之深于汉化者”(陈寅恪《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中语)<sup>⑩</sup>。

又,我国古代出家僧侣,最初是依师傅之姓氏,如竺法乘为竺法护弟子,于法开为于法兰的弟子,皆跟随师姓。东晋释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尊”,僧人当以“释”为姓。后来见到《增一阿含经》中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与佛教经典相符,从此之后僧人普遍以释为姓,称“释某”。然而,不少僧人之法名有重复,容易引起混淆,现举最明显之二例:比如释道安,知名者有两人,一是以义学闻名之东晋名僧,一是以护法名世之北周僧人;又如释慧远,一是东晋庐山释慧远,一是隋代净影寺释慧远。所以早在古代,人们又创造出一种“姓氏”加“法名”来称呼僧人的方法,康宝月、帛道猷、汤慧休、姚道安等就是这种称呼方法的体现。只是康宝月的先祖来自西域,故而其姓氏有些特殊意思。明了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完整知道“康宝月”这一称呼的意义。

解决了康宝月的姓氏问题之后,我们来探讨其事迹。梁代萧子显《南齐书》卷一一《乐志》中,最早记载了释宝月的一些行事:

《永平乐歌》者,竟陵王(萧)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sup>⑪</sup>

萧子良(460-494)字云英,南兰陵(今常州西北)人,为齐武帝萧赜之次子。齐武帝即位后,他被封为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后改南兖州刺史。次年,兼任司徒。萧子良好结交儒士,

以文会友。永明五年(487),萧子良正位为司徒,居建康鸡笼山西邸,召天下有才之士。《南齐书》所谓“诸文士”者,便是萧子良在此时招集的文学之士,其中最知名者当推“竟陵八友”,《梁书·武帝纪上》云:“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sup>⑫</sup>除了“竟陵八友”以外,当时许多文人也与萧子良来往密切。萧子良以皇子之尊,组织这些名士抄写《五经》和百家著述,编成类书《四部要略》千卷。此外,他崇尚佛学,在西邸集名僧讲论佛法,举办佛事。

萧子良文学集团的成员,除了编纂大型类书外,还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他们有时候会展开同题共咏,逞才斗气,这种同题共咏的创作方式,可谓是一种集体创作。可惜的是这种集体创作的诗歌,大多都已亡佚,而他们所作之《永明乐歌》,现在还保存有部分,其中谢朓、王融之诗收录于《乐府诗集》卷七五;且《乐府诗集》所收谢、王所作《永明乐》各为十首,正好符合《南齐书》“人为十曲”之记载。检谢朓诗有“永明一为乐”,王融诗中有“生逢永明乐”,再联系《艺文类聚》卷四三沈约《谢齐竟陵王(宋(齐)永明乐歌)》,均可证明王融、谢朓、沈约等诸文士所作为《永明乐歌》。且《乐府诗集》也引《南齐书·乐志》此段,然题作《永明乐歌》,郭茂倩谓“按此曲永明中造,故曰《永明乐》”。<sup>⑬</sup>由此可知今版《南齐书》误将《永明乐歌》写作《永平乐歌》。而据《乐府诗集》卷四八引《古今乐录》可知宝月资质颖悟,能诗善文,且又精通音律,擅长演奏。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一下,在萧子良文士集体创作《永明乐歌》的过程中,释宝月也很有可能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其精通音律的特长,使他们的诗作能合乎音律,披之管弦。

简言之,释宝月,南朝萧齐时江南诗僧。生卒年不详,其先祖为西域康居人,后移居中国,而宝月出生、成长于中华,故而人称康宝月。宝月能诗善文,精通音律,倍受齐武帝萧赜的赏识,尝参与竟陵王萧子良文人集团集体创作《永明乐歌》的文学活动,闻名于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

## 二 释宝月的诗歌特色

释宝月所作诗歌,今存五首,都是吸取民间曲调写成。如《估客乐》诗云: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有信教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大编珂戛头,何处发扬州。借问编上郎,见侬所欢不。  
初发扬州时,船出平津波。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

《乐府诗集》卷四八引《古今乐录》记载了此诗写作缘起:“《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鎗石为篙足。篙榜者悉着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齐舞十六人,梁八人。”<sup>⑭</sup>《旧唐书》卷二十九《乐志二》、杜佑《通典》卷一四五等记事相同。据此可知,齐武帝即位后追忆往事而作《估客乐》,其诗今存,亦见于《乐府诗集》卷四十八,诗云:“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辞不叙。”然乐府令刘瑶无法将此诗入乐。释宝月于旬日之中,解决了武帝诗歌合乐难的问题,并且

进献上自己创制的两曲富有文学色彩的《估客乐》。所以,释宝月此二曲四首诗刚好作于永明年间。

宝月之作,分别描写了两组场景:第一组是青年男女临别,依依难舍的场景:女子十里相送,拔下金钗送给情郎作为路费;临别时还反复叮嘱,若有人来你就带书信给我,千万不要一去无消息。第二组则是别后女子怀人、在江边怅望情郎的场景:看到江中驶来的大船,便急急向船上人打听情郎的消息;没有得到消息,就猜测是客船从扬州出发时,贾客之间没机会相互问讯,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情郎的消息。这两曲四首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刻画了一位江南女子思念在外情郎的形象。这四首诗,从依依惜别写起,到深深思念结束,前后相互呼应。且我们发现,第一、第三首都描写女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画其外部行为;第二、第四首都是描写女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展示其内心活动。所以,这四首诗歌从整体来看,是一个有机统一、完美动人的文学珍品。看来,宝月在创作此两曲诗歌时也用心至深,颇费心思。

诗歌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采用了符合女主人公身份的本色语言。依,吴人自称(《玉篇·人部》),《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道子颀曰:依知依知。”舩,吴人称大船曰舩,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引汉服虔《通俗文》:“吴船曰舩,晋船曰舩,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者是也。”欢,意为情郎,《子夜歌》之四:“自从别你来,奩器了不开。”两是楚语,指船上候风的竹竿,《文选·郭璞《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曰:“统,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词语的使用,既使诗歌显得质朴,又生动活泼,使得女主人公——一位江南吴楚之地的妙龄女子的形象呼之欲出,我们读来,也能感觉到一股吴楚江南民间气息迎面而来。<sup>⑤</sup>范大士《历代诗发》卷五评论到:“如此俚语却自雅,宋、元人不能为俚语,一俚便俗。”覃召文《禅月诗魂》中分析道:“宝月之清则得益于吴越民俗,有着民歌那种清新旖旎的韵味。这首诗当是诗僧所作的最早的乐府诗之一,如此写儿女情长的作品在后世诗僧中也不多见。”<sup>⑥</sup>

除《估客乐》外,《行路难》也是一首学习民间曲调而创作的诗歌,其诗云:

君不见孤雁关外发,酸嘶度扬越。空城客子心肠断,幽闺思妇气欲绝。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夜夜遥望徒相思,年年望情情不歇。寄我匣中青铜镜,倩人为君除白发。行路难,行路难,夜闻南城汉使度,使我流泪忆长安。

关于此诗的作者归属问题,历来有争议。首先发难者乃梁代钟嵘,其于《诗品》中说:“《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切(通“窃”)而有之。廓子贻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sup>⑦</sup>认为宝月剽窃了柴廓的诗作,且最后用贿赂的方式消除诉讼。此后有不少著作中都以此为据言及宝月偷窃柴廓的诗。然此首《行路难》诗歌全篇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卷九,其作者赫然题为“宝月”。《文苑英华》卷二百、《乐府诗集》卷七〇亦题宝月作。所以历代对于此诗的著作权归属一直争执不休,没有定论。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的情况下,今取《玉台新咏》、《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的说法,以宝月所作展开论述。

关于《行路难》曲调的起源,《乐府诗集》卷七十引《乐府解题》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sup>⑧</sup>《世说新语·任诞》篇“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

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晋书》卷八十三《袁山松传》记事同。又《艺文类聚》卷十九人部吟类引《陈武别传》云:“陈武字国本,休屠胡人。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十数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据此,《行路难》原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所歌唱的北方民歌,文辞比较疏质。袁山松所润色的《行路难歌》,现在没有流传下来。

现存最早用《行路难》曲调进行创作的诗歌,当为“刘宋三大家”之一的鲍照所写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内容大都为歌咏人世的种种忧患和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感。然其中第二首(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第三首(璇闺玉墀上椒阁)、第八首(中庭五株桃)、第九首(剡谿染黄丝)、第十二首(今年阳初花满林)、第十三首(春禽啾啾旦暮鸭)皆是表现思妇闺怨内容的作品,符合《乐府解题》中所说的“离别悲伤之意”特征。

释宝月此首《行路难》,亦不出“离别悲伤之意”之范畴。明代唐汝谔《古诗解》卷一二中分析到:“此互举客子思妇之情以成篇。言孤燕来自关外,而度越扬,其酸嘶之声既入客子思妇之耳矣。凝霜沾衣,浮云漏月,夜夜年年,此情安有停歇之时乎!乃征客复以明镜寄其闺人,闺人望夫之归,虑己之老而倩人以除白发,彼征客宁不思归耶?闻汉使入关,亦方流泪而忆长安也。此诗滥觞唐初七古,恨无笔力安放,故叙事参错。”<sup>⑨</sup>全诗按内容,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开头四句为第一层。以“君不见”开头,这是《行路难》的惯常格式。诗歌以孤雁从北方(关外)出发,一路悲鸣飞往南方(扬越),点出正当深秋时节。就是这悲惨的鸣叫声,惹得征夫心肠断,惹得思妇气欲绝。中间“凝霜夜下拂罗衣……倩人为君除白发”六句,专写幽闺思妇的愁绪。思妇夜不能寐,庭中徘徊,抬头望天,正好看见一轮明月从浮云中间露出。夜晚一次次思念远方的情人,然而年复一年什么也没有盼到。即使如此,思妇的思念还是没有停息。寄相思于明月,更觉相思之深。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写在外的游子的悲伤。诗中“夜闻南城汉使度,使我流泪忆长安”值得注意,汉使、长安在这里均为代指。我们知道,汉朝时有很多人被羁留在北方匈奴之地,不得回归汉朝,闻到汉使就遽兴故国之悲思。作者正是选取了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以汉使代指从故乡来的人,以长安代指游子的故乡。当然,“空城客子”身处北方无疑,但不见得就是流落胡地。忆长安,不仅是思念故乡,更是思念那个翘首盼他归来的女性。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月夜》诗“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同样是以“忆长安”来传达对自己妻子的思念。或许是杜甫从宝月这里获得的灵感吧。

我们也发现,北周时期也有一个僧人曾经写过以《行路难》为题的诗歌,事载《续高僧传》卷十七《周沔阳仙城山释慧命传》,文云:

初,(慧)命与慧思,定业是同。赞激衡楚,词采高拔,命是过之。深味禅心,慧声遐披。着《大品义章》、《融心论》、《还原镜》、《行路难》、《详玄赋》,通述佛理,识者咸诵。文或隐逸未喻于时,有注解者世宗为贵。<sup>⑩</sup>

慧命创作的《行路难》诗歌久佚无传,其具体内容无法得知。然其所写《详玄赋》现存《广弘明集》卷二十九,文章内容完全符合《续高僧传》中所说“通述佛理”的特点。道宣将慧命《行

路难》、《详玄赋》视为“通述佛理”的同类作品,则可知慧命之《行路难》的内容当讲述佛教义理无疑,其诗作当属佛教义理诗之范畴。同样是使用《行路难》曲调写作,慧命阐发的是佛教义理,而宝月表现的是男女相思之情,内容真是大相径庭,宝月与慧命可谓是两类诗僧。再联想到后来梁代傅大士创作的、以及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以《行路难》为题的诗歌,其内容都是表述佛理,这就更显示出释宝月用《行路难》创作男女恋情诗歌的独特。

由上可见,康宝月积极向民间学习,从民间诗歌中吸收养分。其诗歌具有模仿乐府旧题、描写艳情内容两大特色,诗风清新流畅。其实,以僧人身份而写艳情诗歌者,宝月之前有宋汤惠休道夫先路,后有唐释法宣扬其余波,他们都跟南朝时代的文士一样积极学习乐府民歌,模仿乐府古题进行创作。<sup>④</sup>这也使得他们的诗歌内容清新,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艺术手法高妙,读来甚觉可喜。

### 三 结 论

康宝月善解音律,诗有清句,在后世颇有影响,经常被当作咏诗僧的典故。宝月之名,在唐代诗人笔下经常出现,除了前面已引用过的权德舆两首诗作外,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同中书刘舍人题青龙上房》诗云:“笑说金人偈,闲听宝月诗。更怜茶兴在,好出下方迟。”中唐诗人孟郊《同昼上人送郭秀才江南寻兄弟》:“地上春色生,眼前诗彩明,手携片宝月,言是高僧名。”(《孟东野诗》卷八)蜀中著名女诗人薛涛《赋凌云寺二首》其一:“闻说凌云寺里苔,风高日近绝纤埃。横云点染芙蓉壁,似待诗人宝月来。”以上记载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康宝月善为诗文的诗僧形象,在唐代文艺界有着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产。其突出表现是:逮至唐代,由于诗歌的繁荣,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文人与僧人之交往呈现一种新的社会面貌,出现了许多才华横逸的诗僧,遂构成唐代诗人一大枝派。唐代释子周游天下,讲艺论道,“以文章接才子”(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语)成为一时风尚,这在唐大历以还文士与诗僧的交往中尤为突出。因此,南朝工为诗文的康宝月受到唐代才士的热捧,并在诗歌中被一再提及。

元代辛文芳《唐才子传》卷三评论道:“自齐、梁以来,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猷、惠休、宝月之俦,驰骋文苑,沈淫藻思,奇章伟什,绮错星陈,不为寡矣。厥后丧乱,兵革相寻,缙素亦已狼籍,罕有入其流者。”对于宝月等南朝诗僧评价颇高。我们发现,到了明、清代之时,随着对前代文献辑佚之风的兴盛,不少人注意到了释宝月的诗歌,也不断有人情牵宝月,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咏木鱼》其二:“敲空别证生公义,弹指还拈宝月诗。”(《薑斋诗文集·六十自定稿》)查慎行(1650-1727)《重过高旻寺留别湘雨长老》:“茱萸湾口记停船,再叩禅扉已来年。四海僧皈康宝月,三生人说杜樊川。”(《敬业堂诗集》卷三五)钱陈群《奉赠谨堂》其一:“雨过僧来康宝月,花时客对沈休文。”(《香树斋诗文集》诗集卷六)、斌良《横

桥村古寺小憩》:“净契皈依康宝月,偶参竹篔到闍黎。”(《抱冲斋诗集》卷一三)。宝月之人之诗,历千古而闻名。

关于宝月诗歌在后世的影响,还有一事值得一提。20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部门对分布于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的长沙窑主要窑口遗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其中一件瓷器上题诗:“有僧长寄书,无信长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sup>②</sup>此乃宝月《估客乐》第二首诗的变体,宝月诗歌的第一二句作“有客数寄书,无信心相忆”,瓷器题诗变成了“有僧长寄书,无信长相忆”,除此之外,后面两句全然一样。由此也可显出宝月诗歌在唐代民间的受欢迎程度。

可以说,康宝月模仿乐府旧题而创作的诗歌,诗风清新流畅,与文人同类诗作相比也毫不逊色、不遑多让。宝月的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园地中的一朵奇葩,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有理由相信,宝月的诗歌会随着时光的磨砺而发出其独特而耀眼的光芒,历千年而不衰。

### 注:

①唐释皎然:《昼上人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②唐释神清:《北山录》,《大正藏》第52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629页。

③⑩覃召文:《禅月诗魂——中国诗僧纵横谈》,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4页。

④⑧⑪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266-267、265页。

⑤⑥唐权德舆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第120页。

⑦宋释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27页。

⑨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⑫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1页。

⑬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96页。

⑭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页。

⑮⑯⑰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3、699、797页。

⑱张志斌:《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概论》,《求索》2010年第10期,第204页。

⑲转引自黄静德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86页。

⑳唐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561页。

㉑张广村、徐传武:《刘宋文人对吴歌、西曲的接受与宫体诗的产生》,《求索》2011年第12期,第190页。

㉒徐俊:《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以敦煌吐鲁番诗歌写本参校》,《唐研究》1998年第4期,第95-96页。

(责任编辑:群 喜)